

從馬克思到史密斯： 《黃金路》的當代中國想像

王德威

提 要

本文討論《黃金路》所反映中國近三十年經濟狀態的巨變，以及“經濟人”在社會變革中，在主體認知、倫理關係、情感追求上的種種追求、張力與結果。

關鍵詞：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中國 經濟人

張大朋先生是香港企業界與文藝界的傳奇人物，重慶出生，上海長大，1964年畢業於北京石油大學。但就像千萬中國人所遭遇的一樣，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了他的前途。1979年張大朋攜帶家人移民香港，從事化工行業。8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繁榮，他因緣際會，進入地產和股票市場，十幾年間累積了億萬財富。商場以外，張大朋雅好文藝與圍棋，更曾捐贈設立“紅樓夢文學大獎”。這為他的企業家形象平添了浪漫色彩。

1997年，張大朋時值事業頂峰，卻發現罹患肝疾。幸運的是他能赴美接受肝臟移植手術，而且重獲健康。這場與病魔的搏鬥堪稱九死一生，也讓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在漫長的復元期間，他有了從事創作的想法。回顧中國1979年以後二十年

間天翻地覆的改變,他有太多感觸,於是在病榻上一筆一筆寫出一個小人物在商場奮鬥成功的故事——《黃金路》。

《黃金路》是一本奇特的作品。有鑒於張大朋本人 1979 年以來創業發迹的經驗,讀者可能以為這是一本自傳式的小說。但張大朋顯然無意標榜自己的成功。他更有心觀察、反思一代像他這樣的中國人從無到有的過程。他不寫個人,個人的經驗反而呼之欲出。其次,張大朋立足香港,描繪的卻是中國內地的改變。這當然和他本人的背景有關。但沒有了香港經驗作為對照的藍本,《黃金路》就不足以對新興乍起的大陸市場作出如此深入的分析,何況香港和內地這些年的互動愈趨緊密。

更重要的是,文學創作不是張大朋的本業,我們要如何衡量這本小說在過去三十年中國文學史裏的意義? 相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傷痕、反思論述,《黃金路》顧名思義,寫出中國人努力向前看、也向錢看的衝動;相對於種種批判、嘲諷後社會主義怪現狀的作品,《黃金路》擺明了見怪不怪的態度,實實在在地白描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的興起。但當我們將《黃金路》擺在正宗寫實/現實主義小說傳統中來看待時,又發現格格不入之處。原因無他,這本小說不是不寫實,而是太寫實,以致不够“政治正確”了。我以為正是在這些問題所形成的張力下,《黃金路》的意義於焉浮現。

一

《黃金路》的故事發生在中國南方長江沿岸的一個虛構的城市,沙市。1979 年,主人翁程東高中畢業,一心報考大學,但是因為家庭經濟原因,在父親的主導下進入沙市國營化工廠,頂替了父親的工作。這是平淡無奇的人生決定,在特定歷史情境裏卻有了奇妙的轉折。在小說開場短短的幾章裏,張大朋已經寫出改革開放山雨欲來的徵兆。

程東的父親一輩子是工人，他接手以後的任務卻是推銷。化工廠的重頭戲也不再是什麼關乎國計民生的必需品，而是化妝品，銷售重點也從國營企業轉到港資百貨商場。在“社會主義好”的時代，商業行為不出計劃經濟範疇，一切從平等、等價的交換關係開始。曾幾何時，商品需要包裝，銷售需要廣告，營運更建立在細膩的分層承包、回扣佣金的制度上。將本求利，而且利上滾利成爲新時期經濟發展的硬道理。

程東初出茅廬，對上級交辦的任務誠惶誠恐。但不多久，他開始了解他所身處的環境其實早已形成一個複雜的利益網絡。他第一次帶回家的工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外加六塊錢“獎金”。程東努力推銷他的化妝品，也視得到的額外收入爲當然。這是他接受市場經濟啓蒙的第一步。他開始理解在工作之外，有太大的利益潛在於物品交易的過程裏，其中的奧妙不啻是一門學問。張大朋的筆觸平實客觀，讓我們很難判斷程東還有他的同事的行為究竟是出自資本主義的誘惑，還是社會主義的墮落。要緊的是，小說已經爲一個新時代“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出現，埋下伏筆。

這個“經濟人”是理性的動物，目標在於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19世紀約翰·史都華·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指出：“經濟人”的活動不以國家社會福祉爲前提，“而專注於財富追尋，並以達成目標的效率爲判準”^[1]。“經濟人”的能量不在胼手胝足的勞作，而在精打細算，製造利己的資本循環。換句話說，他善於創造並利用“剩餘價值”，從實在的勞動關係裏產生虛擬的交易價值，將之無限擴大，也因此獲得利益。在這層意義上，程東賴以起家的化妝品製造業成爲最好的隱喻。美化“門面”，形成品牌，以廣招徠，成爲新時代商品經濟的基礎。

我們還記得毛澤東社會主義時代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曾經是革命倫理——與革命經濟學——的信條。從張思德

到雷鋒，一系列的榜樣無不標明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人與物的信條。然而張大朋記錄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三年間，一股不可遏抑的新倫理、新經濟狂潮已經蠢蠢欲動。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在國家領導人的背書下，市場開放，資本動員，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終於成為世紀末中國最重要的現象。

《黃金路》裏的程東正是這樣的時代產物。他的白手起家見證了整個中國市場經濟出現的來龍去脈。這是小說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部分。張大朋應該參照了自己和同業的經驗，得以仔細描寫投資獲利的種種方式。程東在沙市化工廠經過幾年的經營，已經建立自己的人脈和“利益共同體”。此時國營企業敗相畢露，他看準時機，以私人資金和政府貸款雙管齊下，收購行將倒閉的工廠；但他部分投資也來自從原單位藉虛擬借貸所轉移出的“呆賬”。程東逐漸從推銷商轉為製造業主，並形成產銷一條龍的模式，因此財源廣進。

但這只是程東初試身手。一旦自己的企業根基穩固，他開始擴張地盤。他利用國家新推動的進出口貿易法規，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藉出口名義套取額外利潤；他也開始涉足百貨業和地產業。程東娶了市長的女兒安娜，經過後者穿針引綫，他投標買到沙市長江口岸的碼頭，得以開拓運輸和漁產業。他又從原來的女友母親那裏得到信息，購買政府釋出拍賣的土地，開發為高級住宅。到了小說後半部分，程東已然是沙市商業大亨，甚至買下了當年第一次僱用他的沙市化工廠。他的下一步是透過電腦網路連線，操作全球基金和股票期貨。從一文不名到億萬家財，這不過二十年間的事而已。

從這樣的情節綜述裏，我們不難看出張大朋的用心。他要描寫的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商人的發達史；他更有意探問這些年來大陸市場經濟規模和內容的起承轉合。程東經營私有企業的階段務求節制資本，有效管理，以少賣多；這比起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雖然已有不同，畢竟仍是“古典”的市場運作法則。當他

開始從事土地和碼頭產業競標投資時，他的眼光已經不再局於可見的產銷環節，而有了投機意味的中長期計劃。最後當他參與基金股票操作，他進入的也是虛擬的全球化財經世界。無論“做多”或“做空”都繫於訊息和數字的瞬息萬變，勞動與生產不過是出實入虛的籌碼之一。與經濟行為同樣發生變化的是對時間觀念的重新設定。從一板一眼的生產操作到投資市場的未來，風險越大，利潤越高。社會主義以往那套線性的歷史決定論顯然不敷運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而且充滿魅惑與矛盾的時代精神。

在《黃金路》的高潮，主人翁程東已經功成名就。他逐漸養成一個新嗜好，就是常拿出他的秘密財產記錄算算自己到底有多少身家。所有的有價證券，主要是國庫券，再加上銀行存款，已經超過一億；所有在各公司的股權……大概值四億，也就是說，它的淨資產已有五億之多。實際的市值，更是遠不止此數。這些計算花了他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得到一種滿足感。他開始想這麼多現金，是否有更好的投資呢^[2]？這時已是1998年。投資無罪，賺錢有理，程東不折不扣的成為中國“成功人士”的表率。他兢兢業業建立自己的商業地盤，也在算計財產時感到“滿足”。他對未來充滿希望，然而回顧來時之路，他是否也同樣感到滿足呢？

二

現代中國小說對現實的處理形形色色，但有關商人與商業的題材並不多見。這也許是因為傳統儒家價值觀念使然，而與共產黨革命建國之後所厲行的意識形態尤其有關。但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消長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現象，有心的作者畢竟留下了可觀的作品。《黃金路》完成於20世紀末，就著這本作品往回看，我們可以簡單勾勒一個世紀以來商業小說的譜系，而這些

作品所觸及的問題其實歷久而彌新。

晚清時代姬文(生卒年不詳)的《市聲》(1908)應該是20世紀初最重要的例子。這部小說描寫一群晚清企業家、商人和發明家努力振興實業的努力。他們本著傳統儒商的熱情,或引進西洋器械,或參與各種投資,或致力發明新猷。然而面對西方和日本的入侵,這些人的努力畢竟不容樂觀。小說因此揭露如下的問題:西方現代知識技術與本土傳統價值的矛盾;機械製造與手工業的競爭;帝國勢力的壟斷與民族主義的自治自主等等。與此同時,姬文的眼光涉及老派殷商與新式暴發戶、工人與農民、機會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相互擦撞,並從中看到一齣又一齣的悲喜劇。

茅盾(1896—1981)是中國寫實主義小說的大師,1930年代曾寫出一系列作品解析中國經濟動蕩的面貌。從《農村三部曲》到《林家鋪子》,再到《多角關係》,茅盾的觸角深入鄉村與城鎮,但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子夜》(1933年)。這部小說寫盡1930年代初上海商場的爾虞我詐,以及股市大崩盤的前因後果。小說中心人物吳荪甫是個民族資本家,既有建立國產企業的胸襟,也不乏壓榨勞工的手段;既是雄才大略的投資者,也是鋌而走險的投機者。游走於西方資本勢力、傳統商業組織、國共兩黨鬥爭間,他一度可能實踐他的理想,最後卻在一場股票投機中敗下陣來,血本無歸。藉此茅盾寫出歷史、政治和商業力量無時或已的角力,還有個人參與者的利害和欲望衝突。他從左派立場出發,自然暗示了資本家必敗的命運,卻無礙他對現實做出自然主義式的客觀敘述。

到了1950年代初,新中國建立,開始施行公有制。周而復(1914—2004)就此寫下《上海的早晨》四部曲。周看出這場大改革的時代意義,有意比照《子夜》的規模作出通盤描述。小說第一部寫民族資本家的負隅頑抗,第二部寫新政府五反運動的倒戈一擊,第三部寫民主改革,第四部寫公私合營,國家資本主

義的展開。周曾憑小說第一部(1958)廣獲好評。但在第二部(1961)出版後,中國已逐漸進入又一場風暴,寫作計劃中斷。文革中周因“修正主義”的罪名受到相當衝擊,文革後他捲土重來,出版小說的第三、第四部。這時已是1979年了——正是《黃金路》主人翁程東開始闖入市場的時候。

閱讀周而復《上海的早晨》因此不能不帶來無限的歷史反諷。他的完結篇遲到了二十年。當他大談國有資本市場的美好遠景時,國家政治經濟早已陷入困境,像程東這樣的小青年已經迫不及待地離開國有企業、開始自行創業了。這是怎樣的時間逆差?尷尬的不只是周而復,更是他所曾信任的那個意識形態機制。而這也正是《黃金路》這類小說出現的意義所在。張大朋幾乎是接著《市聲》、《子夜》、《上海的早晨》形成的脈絡把“故事”繼續講下去。他為20世紀末中國又一次市場形勢與經濟政策的博弈作出見證。

俱往矣,馬克思。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偶像是寫出《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小說甚至藉智者的化身方教授之口,引出史密斯的名言:“人都是自私的,這是人的天性。”史密斯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開山鼻祖”^[3],也是打造“經濟人”的始作俑者。順著這一邏輯,程東商場上的冒險更有了理論的依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仿佛之間,新時期所迸發的各種可能性又把我們帶回到世紀初年《市聲》那個市場經濟初起,人人任意而為的時代。

張大朋的觀點如此逼近自由主義立場,難免引人側目。尤其新左派更可以從社會福利及分配正義的觀點質疑,像程東這類人物的行徑無異是“資本主義復辟”,豈不將我們帶回到《子夜》或更早的時代?對此張大朋藉小說中人物方教授的說法預作回應:眼前無路想回頭,歷史不是過去的先知或偉人說了算;更何況歷史不必重演,經過一個世紀的實驗,新一代的資本家和政府領導人更應該著眼已欲“利”而“利”人的原則,創造一個講

求互惠均富的環境，同時藉由社會主義機制達到分配的平衡。追根究底，史密斯的“經濟人”也只是假設，必須臣服於歷史條件的制約，也應該對現實環境做出因應。

然而張大朋更好的回答可能不是理論，而是回到《黃金路》作為一部小說本身。小說原就是一種多聲複義的社會性敘事活動。藉由小說，張大朋將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大說”還原到一個衆聲喧嘩的語境裏。他告訴我們儘管作為“經濟人”，小說主人翁程東畢竟有血有肉，是社會人，也是倫理人。這使《黃金路》的視野陡然放大，也間接解構了任何理念——包括《黃金路》本身的理念——預設。

程東對市場、對財富的競逐也許從自己出發，但他畢竟不能單打獨鬥。小說介紹了一群和他一起發展的角色，有他的“哥兒們”，有投機分子，有黑道人物。他們浮沉在經濟大潮裏，此起彼落，各有得失。他們唯利是圖，但誰又能排除這樣的決心不是“繼續革命”的變奏？推而廣之，他們所依賴的經濟理性除了與時俱變的精明算計，從不排除傳統裙帶關係、官商勾結乃至江湖義氣，因此發展出合縱聯橫的關係就不是一兩句批判話語就可以說得清的。

小說更涉及程東的家庭背景和情感生活。文革以後，程東周遭的親友鄰人無不爲了改善生活環境各出奇招。這些市井人物的嚮往和追求烘托出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4]。從這個角度來看，程東的愛情冒險就別具意義。程東先後結交四位女性，都是經由業務關係而展開。她們有的愛慕虛榮、有的一往情深、有的城府深遠。這四段情固然不乏歡樂時光，但大抵充滿遺憾。他的初戀李萍背叛他而去；他最傾心的方吉雯因爲絕症不能和他結爲連理；他所娶的市長女兒安娜看似完美，卻自私自利——她也是個力爭上游的“經濟人”。小說最後，他唯一的慰藉是他的情婦。

張大朋未必是寫情高手，但他至少藉著程東的感情起落點

出在商業大潮裏弄潮者的希望與悵惘，還有更重要的，機關算盡後，“命運之輪”（the Wheel of Fortune）的擺佈。這大約是最古老的人生教訓了。《黃金路》的結尾暗示程東前景繼續看好，但全書的敘事卻每每發出弦外之音。回到小說中程東算計自己累積的財產的情景，我們於是要再問，他對感情的投資是否也是無往不利？程東“滿足”了麼？

《黃金路》謹守古典寫實主義小說章法，盡量避免誇張煽情場面，也不多作個人好惡的評斷。程東就像 19 世紀巴爾扎克（Balzac）、福樓拜（Flaubert）筆下那些年輕人一般，進入了一個物質世界的迷宮，只能自求多福。他沒有過多的道德自覺或政治意識，卻也不完全隨波逐流；他看來滿載而歸，卻難掩若有所失。就算他是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英雄人物，也只是個再平凡不過的英雄。

張大朋不是職業小說家，《黃金路》寫來卻中規中矩。比起太多道貌岸然或聲嘶力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黃金路》不動聲色，將正在發生的一切視為當然，這已經暗示一種新的敘事態度以及“話語價值”悄然興起。據此我要說，小說——以及文學——是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而張大朋有心創作的原因或正在於此。《黃金路》完成於 20 世紀末，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裏，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不知道翻了幾番。像程東這樣的投資者是繼續飛黃騰達，還是艱險重重？他會滿足於沙市的一切，還是將會到上海、香港闖天下？而在金錢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價值值得追尋？張大朋自己是過來人，行有餘力，何不繼續以小說形式，寫出當代中國的千變萬化？

注釋：

[1]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74), essay 5, paragraphs 38 and 48.

[2] 張大朋,《黃金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年),頁413。

[3] 同上書,頁207。

[4]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2. "A social experience which is still in progress, often indeed not yet recognized as social but taken to be private, idiosyncratic, and even isolation, but which in analysis (though rarely otherwise) has its emergent, connecting, and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indeed its specific hierarchies. These are often more recognizable at a later stage, when they have been (as often happens) formalized, classified, and in many cases built into institutions and formations. By that time the case is different; a new structure of feeling will usually already have begun to form, in the true social present."

From Karl Marx to Adam Smith: Reading Zhang Dapeng's Golden Path.

Abstract:

This essay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recent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China by means of reading Zhang Dapeng's novel Golden Path. Zhang's novel describes the economic boom in China since the eighties, and the resultant shakeup of ethical and affective relationships at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It is not merely a belated bildungsroman of a man in search of his identity in economic terms, but also a sarcastic critique of a socialist system turned upside down thank to the advancement of liberal desires.

Keywords: Socialism, Capitalism, China, Economic Man